

湖北省图书馆学会
一九七九年年会论文选

湖北省图书馆学会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武汉

前 言

这本论文集是湖北省图书馆学会一九七九年年会上交流的部分学术论文汇编。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几乎断送了我国年青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的学术活动也陷于停顿，留下了整整十年的空白。粉碎“四人帮”，打碎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我们的精神枷锁，结束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迎来了科学文化的春天。在向“四化”进军的伟大途程中，华国锋同志号召“发展各种类型的图书馆，组成为科学研究和广大群众服务的图书馆网。”这个历史性的战斗任务，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图书馆工作者，长期受压抑的积极性创造性迸发出来了，决心在新长征中大显身手，用加倍的努力，夺回被林彪、“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明日岳阳楼上去，岛烟湖雾看春生。”这两句古诗实在是“四人帮”覆灭以后图书馆界大好风光的生动写照。

一九七九年湖北省图书馆学会，围绕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遵循党的“双百”方针，以活跃学术研究，提高图书馆工作水平为目的，运用多种形式，开展了一系列的群众性的学术活动，取得初步的成果。

为了检阅这一时期我省学术研究的成果，我们于十一月在武汉召开了一九七九年年会，出席代表一百一十人，交流论文六十六篇，内容有图书馆学、目录学、情报学、文献学、版本学、科学管理、图书馆网建设、图书馆工作现代化等广泛的问题。我们从这批论文中挑选出有一定代表性的主题较广泛的文章十五篇，编印成册，就正于图书馆界的同志们。

湖北省图书馆学会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目 录

前 言

新中国图书馆事业三十年·····	黄宗忠 (1)
湖北省公共图书馆的三十年·····	湖北省图书馆学会省馆小组编写 (10)
关于作好检索工具利用问题的浅见·····	昌少骞 (19)
谈谈高等学校图书馆的科技文献检索工作·····	陶 炼 张 帆 (23)
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彭斐章 谢灼华 (29)
目录学与科学研究·····	乔好勤 (37)
试谈目录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熊金山 (45)
文献情报存贮检索系统结构方案探索 ——以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情报存贮检索系统的设计为例·····	张琪玉 (51)
关于“标准”集中归类的设想·····	熊明经 (83)
大城市中小学图书馆网建设初探·····	王家全 (94)
对古籍善本一些问题的看法·····	徐孝宏 (98)
试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仇心法” ——章学诚目录学思想初探·····	陈耀盛 (109)
浅谈《中图法》改编线装书·····	谭联秀 孙德安 (117)
关于我国第一部综合《汉语主题词表》的编制与使用·····	刘 荣 (128)
汉字查字法的回顾与探讨 ——《标码查字法》新案试拟·····	孙公望 (137)

新中国图书馆事业三十年

黄宗忠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时期，全国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华国锋同志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不能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国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图书馆战线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何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是图书馆战线当前的主要任务。

认真总结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成就、经验与教训，对于加速实现图书馆工作的重点转移将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国图书馆事业三十年的实践，乃是实现重点转移的基础与出发点。为此，我们认为：一、通过总结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建国三十年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过程、主要成就、基本经验与教训，这样便于我们在实现重点转移时发扬成绩，吸取教训，克服缺点，加速步伐，继续前进；二、通过总结还有助于我们把建国三十年来图书馆战线的是非弄清楚，进一步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实现图书馆工作的重点转移，也不可能真正着手实现图书馆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与图书馆本身的现代化建设。当然我们要实现图书馆工作的重点转移，不仅要总结自己的经验，还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与技术，根

据“洋为中用”的原则，学习别人有用的东西，引进一些先进技术与设备。但两者比较起来，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与教训更为重要，我们要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图书馆，就要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和现有基础出发。就是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与技术，也应当建立在自己现有的基础上，不是盲目的照搬照抄，这就需要总结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总结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基本特点与经验，肯定成绩，明确问题，找出差距。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快速度，少走弯路，早日实现图书馆的现代化，使图书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多作贡献。

怎样总结我们的经验，怎样评价建国三十年来的图书馆事业呢？到底那些工作是做得好的，那些做法是有问题的呢？那些是基本经验，那些是教训呢？检验的唯一标准就是图书馆事业三十年来的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各行各业都必须遵循，图书馆战线也毫无例外。

（一）

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认为，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尽管有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与破坏，出现过起伏不平的阶段，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

旧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它不仅是为地主、

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而且家底是很微薄的，解放前的一九三六年是旧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最高的一年，全国只有图书馆五千一百九十六所。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全国只有图书馆三百九十一所。建国三十年，我国图书馆事业在各方面都得到很大发展，远远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几十倍，几百倍。

首先，各种类型图书馆得到巨大发展，目前已达三十万个以上，相当于一九三六年的六十倍，一九四九年的八百倍。解放初期，我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八十三所，藏书总量一千六百万册。一九七五年达到六百二十四所，其中藏书一百万册以上的二十五所。一九七八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一千二百五十六所，藏书在五百万册以上的三所。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从解放初期的一百四十多万册，一九七八年增至九百八十万册。高等学校图书馆，一九五〇年为一百三十二所，藏书总量七百九十四万册，一九七八年增至五百九十八所，其中藏书一百万册以上的有三十五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在三百万册以上。中国科学院系统的院馆、分院馆、研究所图书室由一九四九年的十七所，一九七九年达一百三十多所，藏书总量一千多万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书由解放初的三十三万册，增至四百五十多万册。工厂、农村、街道、部队等图书馆（室）都有很大发展。

第二、图书馆网不断得到发展和健全。一九五六年公共图书馆系统就提出：“全面发展，统筹规划，分工协作，密切联系”的原则。一九五七年国务院第五十七次会议通过和批准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组成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下的图书小组，相继建立了北京、上海全国第一、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和沈阳、武汉、广州等九个地区性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在国家全面规划和统一管理下，各系统各类型图书馆之间广泛的开展了外文书刊的采购、图书调拨、联合目录编制、干部培训等方面的馆际协作，起

了很好的作用。一九六六年以后被中断。近几年来又有一部分地区的协作组织已恢复，如北京、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陕西、四川等地。集中编目、联合目录等全国性的协作工作也已恢复，并有所进展。特别一九七八年华国锋同志提出：“发展各种类型的图书馆，组成为科学研究和广大群众服务的图书馆网”以后，图书馆网的建设得到更大的重视和进展。目前我国图书馆网以系统图书馆网比较健全、完整。全国性、地区性的图书馆协作网不够稳定和完整。电子计算机存储检索网络正在研究实验中。

第三、随着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支又红又专的图书馆干部队伍已成长壮大起来。这支队伍包括专职干部和业余积极分子两部分，人数很多，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估计全国图书馆专职干部在十万人以上。据一九七九年黑龙江省统计，全省有图书馆专职干部三千人。吉林省县、市公共图书馆专职干部有七百五十人。中国科学院系统的院馆、分院馆、研究所图书室有专职干部二千四百人。在十万以上的专职干部中，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函授生约占百分之三。图书馆干部队伍的迅速壮大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据一九七九年武汉地区七所高等学校图书馆统计，解放初仅七十二人，目前达二百五十一人，增加了三倍多。不仅数量成倍增加，政治与业务质量也不断提高。

第四、随着图书馆干部队伍的不断成长与壮大，图书馆学教育也有很大发展。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已有五十九年的历史了。早在一九二〇年就在武昌文华大学设立了图书科，一九二九年创办了独立的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解放前的二十九年，在高等学校内设立图书馆学系科或独立的专科学校的有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和南京金陵大学、苏州社会教育学院、上海国民大学等设立过图书馆学系科。一九四九年解放

后，全国只有武昌文化图书馆专科学校继续办下来了。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数量有很大发展，除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外，西南师范学院、吉林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学院、中国科技大学都曾办过图书馆学专业。一九七八年以来，全国已有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山西大学、内蒙古师范学院等十多所高等院校恢复或成立图书馆学专业，在校学生一千人以上。建国三十年来，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进修生约二千人，毕业和肄业的函授生一千二百五十人。此外，业余图书馆学校也培养了大批在职干部。短训班是我们图书馆学教育中的一种主要形式，一九五九年就达三十万人次，建国三十年来，通过短训班训练的干部约达五十万人次以上。

第五、图书馆学研究方面已初步建立了一个学科体系，特别在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图书馆目录、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史、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目录学等方面比较突出。建国三十年来，我们先后编制了《东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山东图书馆图书分类新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武汉大学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等。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九年编制了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汉语主题词表。遵照周总理的遗愿，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从一九七八的开始正在积极编制。

第六，在图书馆技术改革和现代化研究方面已迈出可喜的第一步。图书馆的技术改革从一九五八年就已开始，当时主要在图书加工的工序和技术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改革，一九六〇年以后，进一步就图书馆比较笨重的体力劳动和频繁的手工操作方面进行革新，如图书在书库运送、传送索书条、油印

卡片、手工排卡、打号码之类工作，进行了机械化半机械化试验，并取得某些成绩，但由于有待进一步完善，没有推广使用。一九六四年以后又有一些新的发展。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就被停止了。一九七四年有关部门开始了“七四八工程”的研究。目前有许多单位正在组织人力就电子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缩微复印技术、视听技术、图书馆建筑与设备、机器翻译等进行研究。有的采取土洋结合，对图书馆的某些操作程序进行了改革，实现机械化或半机械化。

第七、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在保存文化遗产和利用馆藏图书资料，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积极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在为教学、科学研究服务，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配合这些工作，编制了大量的书目、联合目录，举办了各种报告会、讲座、图书展览，流通了大量的图书资料。

(二)

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起伏不平的，是波浪式前进的。它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两个阶段、两次变革、四个时期。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传统的 management 方法与传统的 technical 方法为主，也就是传统的图书馆时代，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基本上处于传统的图书馆时代；第二个阶段，就是由传统的图书馆过渡到现代化的图书馆，也就是由传统的 management 方法和手工操作的传统技术过渡到现代技术和传统技术并存的阶级。这一阶段，图书馆的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图书馆组织网络化、工作标准化、技术现代化，在这一阶段中某些传统的技术仍然保留着。这个阶段，在国外称为“第二代图书馆”。它

的显著标志就是以现代技术为主。这是我们目前正在跨向的阶段,正在经历着的阶段,世界先进的一些图书馆都经历了这两个阶段。

两次变革:一次是解放初期图书馆所有制的变革,我们把国民党时期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的图书馆变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有,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变革我们在解放初期就已经完成,它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次变革,就是技术方法上的变革。一是要把传统的落后的手工操作技术逐步用电子计算机技术来代替,使图书资料的采购、加工、存储、检索、借阅自动化;二是把传统的藏书形式——印刷品,逐步应用光学技术和声相技术使图书资料向缩微化、视听化发展。这一变革,已经开始,其中电子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正在进行研究实验,缩微复印技术、视听技术有些图书馆早已采用。随着这一变革的实现,我国图书馆将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

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稳健发展的时期,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这个时期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是稳步前进、健康发展的。这一时期首先对旧有的图书馆进行了整顿改造,把旧社会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图书馆变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有,把四十四所私立图书馆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调整了藏书成分,充实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改革和废除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整顿了图书馆干部队伍,从而使旧有的图书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其次,学习了苏联图书馆的某些经验与技术,翻译了一批苏联图书馆学的著作,对当时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但由于我们在学习时缺乏具体分析,也给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带来某些问题。第三、各种类型图书馆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工会图书馆和农村图书室从无到有或从薄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如中国科学院系统图书

馆由一九四九年的十七所,一九五七年发展到一百零一所,藏书达到五百五十万册。一九五六年底,农村图书室发展到一十八万二千九百六十个,工会图书馆一万七千四百八十六个。第四、为大众服务的工作开展得很活跃,形式多样,效果显著;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一九五六年周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增加各个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图书费并加以合理的使用,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极大地改善外国书刊的进口工作,并且使现有的书刊得到合理的分配。”自周总理的指示以后,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普遍得到重视,各图书馆设立了专门机构,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并有明显效果。第五、图书馆之间广泛的开展了协作,先后建立了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初步形成系统图书馆网和全国、地区性协作网。第六、图书馆学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活跃,出版的专业书刊与论文较多。这一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得比较快,存在的问题就是抓为科学研究服务工作抓晚了,本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九五三年就着手抓,由于对此认识不够,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开始抓。结果造成图书馆工作被动,图书资料缺乏,影响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第二个时期是波浪式前进的时期,这一时期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五年,这个时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起伏的坡度较大,但仍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这个时期还可分为两段:一段是从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这一段图书馆员和干部的思想比较解放;基层图书馆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农村人民公社图书馆一九五八年就达四十七万三千八百个;山西、吉林、黑龙江、宁夏等省、市、

自治区图书馆相继建立起来；图书馆服务工作有很大改善，开门办馆，送书上门，变被动为主动，图书流通量显著增加；图书馆的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作了大胆的尝试；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学研究都有相应的发展。但是这一段，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和一些同志思想方法片面、绝对化，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失去平衡，基层图书馆发展过快，国家和群众负担不起，得不到巩固，如农村人民公社图书馆一九五八年四十七万多个，一九五九年下降到二十八万多个。二是在图书馆的任务与服务对象上，提出“更须坚持工农兵方向”，注意了普及，忽视了提高；强调了为广大群众服务，忽视和削弱有的甚至取消了为科学研究和知识分子服务。三是在图书馆藏书的藏与用的关系上产生了混乱，失去平衡，片面强调藏书的使用一面和片面追求图书流通量，提出“一切为了读者”，“为人找书，为书找人”，“提高图书流通率，做到翻上加翻，翻了又翻”，忽视了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之一是搜集、整理、保藏图书；强调“开门办馆，送书上门”，忽视了馆内的阵地工作。结果造成一部分图书丢失、缺藏、堆积，书库混乱，目录作用削弱，图书馆基础工作受到破坏。由于对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处理不够好，古籍与外文图书的收藏、外借都受到影响。四是在图书馆的规章制度上，由于强调“大破大立”，原有的一些正确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也不能得到贯彻执行，有的只破不立。五是在图书馆学研究上，由于开展了“拨白旗、插红旗”，党的双百方针不能得到很好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不能得到很好落实。六是在图书馆干部培养上，注意了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忽视了业务技术上的钻研与提高，造成红专关系混乱。七是在思想方面，注意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但缺乏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结果出现片面性、绝对化和浮夸风。

一九六二年以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图书馆战线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方面主要作了下列工作：一是在事业的发展上，调整了与国民经济不相适应的部分。二是在图书馆的任务与服务对象上，强调为广大群众服务与为科学研究服务两者不可忽视，但可以有所侧重和分工。三是进一步加强了图书馆的基础工作，如藏书建设、内部整理、目录体系的完整、规章制度的建立与执行。四是图书馆为读者服务的工作，注意馆内阵地工作与馆外活动相结合，整顿了读者队伍，提高服务质量与效果，流通工作既讲数量又讲质量。在为科学研究服务方面，强调“广、快、精、准”，重点服务，对口服务。五是干部的培养上，注意又红又专，政治思想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大练基本功，举办了各种业余学校和短训班。六是图书馆之间的协作进一步发展，内容更加丰富。七是图书馆学的研究由于贯彻了双百方针，学术空气比较活跃，写出的论文许多至今仍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由于“八字”方针的贯彻，从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图书馆事业又出现了继续前进的局面。

第三个时期，是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和破坏图书馆事业的时期，这一时期从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林彪、“四人帮”和那个所谓“理论权威”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在图书馆推行一条极左路线，大搞“全面专政”，制造了大批冤案、假案、错案，使我国图书馆事业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把图书馆搞到取消和崩溃的边缘，使原来与世界先进水平已缩小的差距又拉大了。林彪、“四人帮”对图书馆事业的干扰和破坏，概括起来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一是全盘否定十七年的图书馆事业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否定图书馆的社会主义性质，污蔑图书馆事业十七年是“黑线专政”、“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文化乐园”、“封建藏书楼和全民图书馆的混合

体”、“大放封资修毒素”。二是任意歪曲和篡改图书馆的性质、作用，以图书馆的阶级性代替图书馆的科学性、教育性、社会性、服务性、保存性，把阶级性当成图书馆的唯一性质，代替一切，否定图书馆性质的多样性；以阶级斗争和为阶级斗争服务，代替图书馆的一切作用和工作，把图书馆抓业务工作，说成是“不抓纲”，把为阶级斗争服务代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代替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三是肆意歪曲和篡改图书馆的方针、任务和服务对象，在服务对象上大搞唯成分论，制造莫须有的“分工论”、“间接服务论”、“全民服务论”等罪名，挑动工农兵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严重对立。他们把图书馆为工农兵服务与为知识分子服务对立起来，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为生产、科学研究、教学服务对立起来，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把为生产服务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把为科学研究服务说成是“为资产阶级专家服务”，把为教学服务说成是“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四是把图书馆为保存文化遗产、人类知识、精神财富而收藏的图书资料，污蔑为“封资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禁锢政策、愚民政策，使大批有用的藏书在一段长时间内被封闭，不许流通。张春桥胡说什么“图书馆的书，别看它有几百万册，有用的只有两书架”。意思是说只有马列、毛主席著作有用，其他都无用。他们把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保存下来的古籍、珍藏视为“四旧”、“毒草”，疯狂叫嚣要统统烧掉，结果有些地区大量书刊被烧被毁。五是破坏图书馆的藏书建设，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洋为中用”的方针，把外文书刊的收藏通通斥之为“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许多图书馆的外文书刊采购被终止，外文连续性刊物被中断，搞得藏书体系残缺不齐。六是破坏和摧残图书馆干部队伍，歪曲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反对钻研业务，把工作踏实，刻苦钻研业务的馆员与干

部打成“白专道路”，他们混淆敌我界限，把学术上有成就的专家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把大批干部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长期下放农村，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七是大搞无政府主义，反对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与科学管理，把图书馆的规章制度污蔑为“管、卡、压”，使图书馆长期无章可循，造成混乱。八是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学研究被中断好几年。总之，林彪、“四人帮”对图书馆的破坏是全面的严重的，图书馆战线是“重灾区”之一。

第四个时期，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图书馆迈进时期。这是从一九七六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的。这一时期主要工作：一是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拨乱反正，分清路线是非，端正思想路线；二是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充分调动图书馆人员和干部的积极性；三是进一步明确图书馆性质、作用、方针、任务、服务对象；四是整顿内部，清理馆藏，健全目录，调整关系，建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五是各类型图书馆、图书馆网、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学研究得到一定的发展，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学会相继成立；六是图书馆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和图书馆本身的现代化建设，作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并且迈出了新的一步。

回顾图书馆三十年经历的四个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有起有落的，波浪式前进的，但总的来说成绩是很大的。特别是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以后，这三段的图书馆工作是作得比较好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比较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了毛主席的思想，在理解图书馆的性质、作用和贯彻图书馆的方针、任务、服务对象方面比较全面稳妥，摇摆得少，没有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图书馆的基础工作比较扎实，藏书建

设、内部整理、目录都比较有条理，规章制度比较健全，管理比较科学；图书馆为读者服务的工作讲究实效，形式主义、华而不实的东西少，效果比较显著；图书馆干部队伍建设抓得紧，成长速度较快，注意党的政策，注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比较正确地处理红与专的关系，人们心情舒畅；图书馆之间开展的协作比较活跃；学术空气比较浓；图书馆的各种关系处理比较好，形而上学、片面性、绝对化比较少；在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经验方面，能根据中国的实际，实事求是地给予介绍和学习。

（三）

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回顾三十年来图书馆事业的实践，的确给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与教训，也摸索了一些基本的规律，最基本的有下面几点：

第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必须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保持平衡。经济是基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必须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走得太快了或走过了头，就会影响和破坏国民经济的发展，走慢了，就不能对国民经济起促进作用，就要影响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三十年的实践，走得太快了，走慢了的情况都出现过，如一九五八年基层图书馆的发展速度就超出了国民经济所能负担的情况，后来进行了调整。但三十年来总的情况，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走慢了，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发展需要是主要的。造成不能相适应的主要原因，是图书馆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没有被社会充分认识，因而得不到社会的重视，投资过少，从而造成我国图书馆事业落后，不能适应今天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第二，在图书馆事业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正确理解图书馆的方针、任务和服务对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

我国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唯一指导思想，过去是这样，今后也仍然是这样，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在图书馆事业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必须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十年来，在图书馆的性质、作用、方针、任务和服务对象上，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外，我们有些同志由于不能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在几个阶段上出现了片面性、绝对化，把图书馆的阶级性代替图书馆的一切性质，把为阶级斗争服务代替图书馆的一切工作，把为工农兵服务与为知识分子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为生产、科学研究服务对立起来，给图书馆工作造成混乱，给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带来损失。一九五六年文化部召开的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就明确规定，人民的图书馆事业有两项基本任务：一是为人民群众服务，一是为科学研究服务，这两项任务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一九五八年，有的同志就只强调为人民大众服务，忽视为科学研究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甚至受到批判，说成是“专家路线”，为科学研究服务的机构被撤销。一九六二年通过调整以后，又重新提出了这两项任务，进一步加强了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但一九六六年以后，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干扰下，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又受到批判，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发展各种类型的图书馆，组成为科学研究和广大群众服务的图书馆网”。几经反复，实践已证明这两项任务的提法是正确的，多年的是非弄清楚了，图书馆的方针、任务和服务对象明确了。

第三，调动两个积极性，坚持国家办馆与群众办馆相结合的原则，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图书馆事业。实践证明：我国图书馆事

业三十年发展这样快，取得很大成就，这是一条主要的经验。国家办馆与群众办馆，应以国家办馆为主，群众办馆为辅。由于我们国家的底子薄，人口多，需要又大，社会主义建设只有三十年的时间，办图书馆一切都靠国家出钱是不可能的，但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我们又必须发动群众办馆，特别是广大农村和城镇的街道。群众办馆必须根据需求和可能条件，坚持自愿原则，坚持业余、小型、多样。

第四，扎扎实实做好图书馆的基础工作，正确处理好图书馆基础工作与读者服务工作的关系。图书馆的基础工作包括图书的收集、整理、保藏、目录等，它是图书馆为读者服务的物质基础。一个图书馆，如果基础工作作得好，就能大部或全部满足读者的需要，提高图书馆为读者服务的质量；相反，如果图书馆的基础工作搞得不好，藏书残缺不齐，书库和目录混乱，就必然影响为读者服务的工作。两者是相互制约的。在实践中，大多数同志已认识到这种辩证关系和内在联系，但是也有些同志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陷于形而上学，强调为读者服务就忽视图书馆基础工作，强调图书馆基础工作又忽视为读者服务。三十年来，这两种现象都出现过，但片面强调为读者服务工作，而忽视图书馆基础工作是主要的。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我们某些人思想上的片面性，我国图书馆的基础工作三十年来出现过两次反复，两次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两次进行恢复、整顿、损失是巨大的，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教训是深刻的。一次是一九五八年，由于片面地强调为读者服务，片面追求图书流通量，造成藏书丢失，书库混乱，目录失去作用，结果影响藏书的正常流通。一九六二年贯彻“八字”方针，经过三、四年的整顿、恢复、清理，才使图书馆的收藏与流通工作走向正轨。第二次是一九六六年以后，由于林

彪、“四人帮”的破坏，图书馆的收集工作一度中断，图书的加工、整理等内部工作一度停顿，藏书有的被丢失，有的被烧毁，目录混乱，藏书数量不清。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图书馆组织力量，抓了整顿恢复工作，清理了藏书，整顿了目录，但真正要完全走向正轨还需要一段时间，还要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才能达到。因此，图书馆的基础工作是不能随意破坏的，破坏了就要受到惩罚。这是图书馆工作的一条基本规律。

第五，随着图书资料出版数量的激剧增长，图书馆藏书成倍增加，图书馆技术方法和服务手段必须不断改变。这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条经验与规律，否则就不能适应图书馆工作要求。近三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出版物数量激增。最近几年，全世界每年出版的书籍达六十万种左右，新出期刊在一万种以上，据国外估计，今后每年将以百分之十二点五的速度增长。随着图书资料的出版数量激增，图书馆的收藏也迅速扩大，如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与解放初期相比增加了六倍。随着图书馆藏书的成倍扩大，给图书馆带来的问题是空间紧张，馆舍面积少，工作量成倍增加，馆员人手少。造成藏书堆积、混乱，不能很好利用。随着图书资料出版数量的激增，给读者带来的问题是查找文献资料的时间越来越占用得多，而且难于查到。以化学文献为例，光是浏览一下世界上一年内发表的有关化学论文和著作，一位化学家每周看四十小时，要读四十八年。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改进图书馆的技术方法和服务手段，采用现代化的技术设备。目前国外采用电子计算机采购、加工、管理、存储、检索图书资料，采用缩微复印技术和视听技术都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建国三十年来，由于我们对这一规律认识不深，我们图书馆技术仍然停留在传统技术上，因此显得矛盾多，工作落后，

适应不了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的需要。

第六，随着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进程，建立一支数量与质量相适应的专业队伍，这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图书馆事业是随着时代不断深入发展的，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数量上、质量上的要求也是不断提高。过去三十年，我国图书馆干部队伍与事业的发展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这种适应也只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当前根据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图书馆干部队伍不管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是很不相适应的，也是我们在重点转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七，图书馆学研究的开展，必须走在事业建设的前面才能起指导和促进作用。图书馆事业要发展，图书馆工作质量和图书学教育水平要提高，关键是要开展图书馆学的研究。图书馆学的研究水平很低，是不可能有一高速度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也不可能有一高质量的图书馆工作和高水平的图书学教育。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某些方面发展缓慢，工作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图书馆学研究的开展。目前全国还没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职研究人员，就是从事实工作的同志开展一些研究，也是当成副业，而且比较分散没有很好的统一组织，有些单位还加以限制。我们认为，要搞好图书馆学的研究，除有关部门重视外，在安排上必须比事业建设先走一步，这样才能对事业建设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例如图书馆的现代化技术，不先学习研究实践，就不可能应用于实际工作，就是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也是为了指导今后的工作。

第八，加强领导，健全图书馆事业的领导体制。加强党和政府部门对各级图书馆事业的领导，是保证我国图书馆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还应该看到，由于我国图书馆事业领导

体制不健全，影响了我们事业的发展，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绩和更高速度，但是没有达到。建国三十年了，我国图书馆事业一直处于分散领导，各自为政，从中央一级来说，文化部到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图书馆处，一直只分管公共图书馆系统，其他图书馆由有关部门领导。这样，对事业的发展全国没有一个统一规划，干部的培训、图书馆学的研究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图书馆工作条例、人员编制、馆员职称都是多种多样不统一的，图书馆网络化、标准化、现代化没有统一的部门领导和组织、规划。这种状况不改变，必须影响图书馆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影响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进程。为此，建议中央加强对图书馆事业的统一领导，设立统一管理全国图书馆事业的机构。

回顾我国图书馆事业三十年的发展过程，概括起来，我国图书馆事业已有一定的规模，建立了一支相应的专业队伍，图书馆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我们的规模与国外先进国家比还是小的，与我们九亿多人口的需要来看矛盾还是大的，我们的工作基础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图书馆基础上发展的，家底薄，藏书量少，设备差，我们的经验乃是传统手工操作的，我们的队伍数量与质量都是与事业发展不相适应的。从这些现实出发，我们认为：一要有雄心壮志，有决心改变落后面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二要从现有基础出发，扎扎实实，认真搞好图书馆工作的重点转移；三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与技术。让我们在现有基础上，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肃清极左流毒，认真搞好图书馆工作的重点转移，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图书馆现代化而奋斗！

一九七九年五月完稿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六日修改

湖北省公共图书馆的三十年

湖北省图书馆学会省馆小组编写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旧湖北省立武昌图书馆、旧汉口市立图书馆、旧湖北省立恩施图书馆三个破烂摊子。当时湖北全省就只有这么三所公共图书馆，以湖北省立武昌图书馆为例：藏书不足二十万册，工作人员数十人，读者寥寥无几，每月到馆读者只有几十个人。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发挥图书馆的作用。

现在，我省有湖北省图书馆一所，藏书约二百万册，工作人员九十六人，建筑面积四千平方米，现有一般读者七千二百七十二人，科技读者一千一百四十人。还有武汉图书馆一所，藏书一百万册，工作人员七十七人，馆舍面积五千三百平方米，一九七八年全年接待读者七万六千六百四十九人次。此外，黄石、襄樊、宜昌、沙市、十堰五个市，也都设有市图书馆。在湖北全省七十三个县（区），有县图书馆六十多个，（其中已列入国家计划的四十个，）预计到一九八二年，可以在全省范围内普及县、市馆。各县市又以县、市馆为核心，辅导建立了遍布全省的工厂、农村和街道图书室，作为向我省四千万人民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阵地。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提出：“……发展各种类型的图书馆，组成为科学研究和广大群众服务的图书馆网。”我省公共图书馆工作者三十年来的辛勤努力，对贯彻华国锋同志指引的道路，是非常有益的。

当然，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

有循着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革命路线顺利前进的时候，也有遭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破坏干扰的时候。回顾三十年的历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建设我省公共图书馆事业，使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是很有必要的。

（一）

开国十七年，我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努力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方针、路线，在周总理同志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我们发扬公共图书馆的固有特点和客观规律，改造旧图书馆，另新建各级图书馆多所，共同发挥书刊资料的效用，在为科研服务与提高群众文化水平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十七年的最初几年，我们首先是做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图书馆的工作，使它们面向群众，走毛泽东同志指引的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其次是培养教育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工作水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思想。

在接管旧湖北省馆与旧汉口市馆以后，党就派进一批青年干部，建党建团，同时团结教育留用的旧人员，从各个方面改变旧图书馆的面貌。当时抓紧学习，组织全体干部学《社会发展简史》等书。另方面动员干部参加党的中心工作，绝大部分人员参加了土改、三反五反等运动，在做工作的同时收

到培养锻炼干部的效果。此后又注意干部的业务培训，开办训练班，为中南各省暨湖北培训干部，其中不少学员现在仍然是各地图书馆的骨干。

在业务工作方面，我们着重抓两点：一是向广大工农兵开门，二是配合党的中心开展工作。

湖北和武汉两馆都添设了“推广部”，把图书工作推广到馆外去。当时提的口号是“走出图书馆，面向工农兵”。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的干部意气风发地，背起书箱送书到各工厂与建筑工地供工人读者阅读，建立了一批图书流通站。那时候，即使是春节假期里，纵然在风雪严寒中，我们的干部依然活跃在群众中间，当好图书宣传员。一九五四年，第一纱厂（今六棉）工会适应工人阅读要求，在省图书馆辅导支援下，扩大流通站为工会图书室。此后，许多工厂和工地都陆续建立了工会图书室。一九五五年，我们开始下乡送书，在武昌县的大桥农业合作社等处设置了图书流通站。在下厂下乡下工地为工农兵读者服务的道路上，迈开了脚步。

为了密切图书馆和群众的联系，向读者推荐优秀读物，我们采取了多种形式。省、市两馆经常举办讲座或报告会，有配合中心讲解时事的，有评介文艺书籍的，也有介绍科学知识的。这些讲座受到省、市委宣传部的表扬与支持。我们的馆员也曾下厂下乡做介绍新书的报告。在这方面的经验是：要组织一个讲师团，经常与讲师们联系，力求有计划地安排好报告会的日程。又要经常联系基本听众与听讲单位，收集反应，改进工作。更要配合讲座宣传图书，印发推荐目录，吸引读者借书。除了讲座以外，两馆还举办图书图片展览，诗歌朗诵会、读者墙报、儿童故事会等等，受到读者欢迎。

五十年代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我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也相应地得到发

展。一九五二年，武汉市文化局扩充市立图书馆，改称武汉图书馆。充实藏书，增加到十二万册。增添馆舍，一九五三年迁来中山大道现址开馆。扩大编制为四十五人，开辟了五个阅览室。一九五八年又把儿童部扩建为武汉儿童图书馆，二十多年来，由于和附近的学校联系密切，互相配合，儿童阅览室经常满座，受到社会上的重视与欢迎。

与此同时，旧恩施图书馆也经改建为恩施地区图书馆，接待了大批读者。

一九五五年，全省各地兴建的市图书馆有黄石、襄樊、宜昌、沙市等四所，各市馆都大力开展基层图书活动，辅导当地厂矿街道举办图书室。黄石市图书馆自建馆以来，积累藏书近四十万册，期刊一千一百多种。这个馆一向重视对当地厂矿图书活动的辅导。大冶钢厂从五十年代在黄石市图书馆辅导下，建立厂部图书馆以来，为广大职工解决了不少在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工作越做越深入，近几年并且协助一些车间、工段、宿舍办起了十七个基层图书室。宜昌市图书馆开展基层图书活动也比较早，距今二十多年前，他们就送书到作家黄声笑同志所在的码头上，向爱好文学的青年们提供阅读资料。沙市图书馆在辅导工厂图书室方面，襄樊市图书馆在辅导街道图书室方面的工作，也都是很出色的。

一九五六年，我省又建立了浠水、松滋、江陵、应城、鄂城、郧县、孝感等七所县图书馆。一九五八年，我省的县图书馆增加到二十六所。它们突破了“据守城关”的框框，下到农村建立了许多流通图书的据点。浠水县馆在云路、洗马，宜都县馆在潘湾、长丰，应城县馆在盛滩、黄滩，新洲县馆在刘集、大渡的工作都是比较出色的。省图书馆也用自己的藏书对各县馆进行支援，在孝感的卧龙，鄂城的华容都有省馆的借书点。中央文化部对此非常重视，曾于一九五八年派专人前来湖北，总结浠水县图书馆下乡办

点的经验。

* * *

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央文化部召开了全国公共图书馆工作会议，并指出：公共图书馆事业除了为普及群众文化知识很好地开展各项工作外，还要配合“向科学进军”加强为科学研究服务。这在省、市、自治区的公共图书馆，更是一项主要的任务。

按照全国公共图书馆工作会议精神，市、县图书馆与省级图书馆应当有所分工。市、县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是为广大群众服务。省图书馆同时承担为科学研究和为广大群众服务两项任务，侧重为科研服务。

任务明确，促进了工作的开展。湖北省图书馆为了适应新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在组织机构方面，建立参考研究部，设置科学阅览室，调配一部分人力专门做这项工作。在储备书刊资料方面，请教本省的专家、学者，请他们圈选订购外文书刊的目录，以凭采购。又组织人力清理旧平装书、线装书，积极准备科研资料。在目录工作方面，编印武汉地区中、西、日文旧期刊联合目录，编制馆藏旧平装书分类目录和书名目录，编写线装书分类排架登记簿，便利科研读者查目借书。

在那个时候，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毛泽东同志当即把技术革命问题提上了日程，省级图书馆加强为科研服务是配合了国民经济高涨的形势的。图书馆作为上层建筑，是适应着经济基础的要求开展工作的。

在执行这项工作之初，由于没有经验，也出现过缺点。我们为了腾出人力物力来办好为科研服务的事业，在收缩为一般读者服务的图书流通站方面操之过急，在半年之内移交出去一百多个流通站；本来是还可以安置得更妥善一些的。这里面的经验教训是：第一，凡是承担两项任务的图书馆，面对着

目的要求不同的两部分读者——科研读者与一般读者，要考虑两项任务的全面执行，确定两部分读者的发展比例，并经常加以调整。第二，图书馆为了满足两部分读者的阅读要求，控制发展读者人数是完全应该的。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依靠一系列改进工作的措施，而不能单纯地从收缩某些阵地着眼。当时我们在这方面注意得不够。

* * *

三年困难的时候，我省公共图书馆事业也遇到困难。第一方面，各市、县图书馆由于精简机构的缘故，被合并到市、县文化馆里去了。当时，国民经济遇到困难，文化事业也进行了调整，图书馆事业也须根据经济条件许可的限度进行调整。但是如何进行调整，却要经过调查研究，慎重从事。然而当时没有这样做，简单地把全省各县的县图书馆（以及几个市图书馆）撤销并入了县（市）文化馆。公共图书馆是联系着广大群众的宣教机构，遇到经费困难，可以压缩开支，但不宜从建制上大量撤销，以避免广大群众丧失自学的阵地，基层图书活动失去辅导力量。一九六一年全部撤销县馆使事业中断，是个严重教训。

第二方面，一九五八年，在当时左倾思想影响下，我们也没有认真的考虑主客观条件，设立了过多的图书流通站，发展过于迅猛。一九五九年年初，全国图书馆工作跃进大会开幕，会上有人提出“十比倡议书”，各馆“应战”，我们也提出了过高的发展读者和流通图书数字；这样，在阅览流通图书方面，虽然也适应了读者的要求，收到一定的宣教效果；但这两方面的压力都压到了外借处，于是抢时间，赶任务，因而手续不完备、记录不齐全的情况很多，给催还图书工作造成了困难。这个时候，发展任务压倒一切，全馆大部分人员外出跑发展，使其他业务部门的工作受很大影响，全馆工作因而失去了平衡。

所谓全馆工作平衡，指的是书刊资料的采购、分编、图书管理、书目工作与外借、阅览、参考咨询、业务辅导工作之间的平衡。或者说是内部工作与外部工作之间的平衡。经验说明：外部工作战线过长，牵扯了内部工作的人力，内部工作抓不上去，因而造成积压图书，不便借阅的恶果，必然影响外部工作的质量。由此可见，统一全馆步伐，努力做到全馆各项工作平衡进展，是应该经常注意的。

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引下，湖北省图书馆着重研究了调整全馆工作，提高质量问题。当时提出了抓调整读者、整顿藏书、整顿目录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九六一年前后，购书经费被削减，图书馆事业相应地有所收缩。但我们以“三整顿”为主线，做出一定成绩，全馆工作质量有所提高，为科学研究服务的职能发挥得比较好。

第一，关于调整读者。我们在一九五八与五九两年，在仓促的发展过程中，发展一般读者过多，不切合侧重为科研服务的方针，同时还包含一定数量的虚数，为此不能不有一九六一年的调整。省图书馆在调整时根据本单位的人力、藏书、馆舍、设备等项条件，估计我们的负荷能力，确定发展一般读者的人数为六千人，经常到馆借书的保证数为三千六百人。发展科研读者的人数为一千二百人。此后几年大体上比照这个数字，逐年有所增加。

第二，关于整顿藏书。在一九六一年以前几年，发展读者过多，借书手续不完备，遗失不少书籍。我们核对登记簿、注销登记了这些书，并重点补配了一部分。

一九六一年前后，核减了图书馆的购书经费。经费减少促使我们过细地研究工作，以求保证工作质量。我们体会到：（一）省级图书馆基本藏书的面要广一些，在经费不充裕的情况下，我们提出“三保三压”的采

购原则，即：“保品种、压复本”，“保科研、压一般”，“保期刊、压图书”。这是从省馆侧重为科研服务的前提决定的，也是在经费锐减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办法。即使这样做，也未能保证应该入藏的书刊全部进馆，这是十分遗憾的事。图书非一般商品可比，当某一种书刊出版后，如不及时购进，以后是往往很难补配的。这就告诉我们，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图书馆的购书经费也应尽力保证，不可轻易地大幅度削减，以免购书中断，影响藏书建设。（二）为了确保省馆藏书系统完整，建立了“保存本”制度。新书在初次进馆的时候，至少留一本做“保存本”。“保存本”不外借，只在此书所有复本都被借光的情况下，允许在馆内阅览。乍看起来，“保存本”制度似乎是限制了读者，妨碍了书刊充分利用，实际上是保障了广大读者的最广泛的阅读利益。

第三，关于整顿目录。前此数年，由于内外部工作失去平衡，藏书建设与目录建设都被削弱了。一九六一年为了提高目录质量，我们就加强采编部，抓整顿目录工作：

（一）在读者目录中，除原有分类目录和书名目录外，增加一套著者目录。（二）成立线装书编目小组，清理几年来未曾清理的线装古籍，编目制卡，供科研读者查目索书。

（三）清理积压数年的外文书，编目制卡，上架备借。（四）通过武汉地区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在本馆建立外文书查目中心。（这项工作后因人力物力限制，没有坚持下来。）

（五）科学服务部为了联系重点读者，提倡有重点的对口服务，向他们提供“对口目录”。我们为了对上口，一方面逐步深入地了解读者意图，一方面陆续地提供相应的书刊资料。一九六一年，我们从武钢钢铁研究所了解到解决“含铜钢种”问题是武钢推进炼钢轧钢事业的关键。我们就着手收集国外文献资料，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经常到武钢去参加他们的会议，参观他们的车

间，针对需要，先后共查出文献近两千种，经武钢专家核定能用的文献资料共一千多种。在一九六三年武钢炼成新钢种时，钢铁研究所在省图书馆提供资料的基础上，印成包括八〇六种文献的“铜钢文摘”一厚本。经验告诉我们：为科研读者做对口服务工作，选题最重要。一九六一年服务武钢抓含铜钢种，是抓住了中心问题。科研从来是走在生产前面的，解决了科研中的中心问题，生产中存在的难关就突破了，生产就发展了。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还加强了武汉地区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工作，编印了《武汉地区农业图书联合目录》、《武汉地区化学化工书籍联合目录》、《武汉地区西文医学书籍联合目录》、《武汉地区标准联合目录》以及《订购外文期刊联合目录》等。此外，还进行了向读者发放联合借阅证，组织武汉地区各图书馆订立馆际互借合同，组织各馆协调采购外文书刊等活动，为科研事业创设了条件。

在“八字方针”具体指导下，湖北省图书馆在“三整顿”当中做出了成绩，提高了工作质量，受到读者的尊重与表扬。

但是，到了一九六四年，文学艺术界刮起小整风。这股小整风吹到湖北省图书馆来了，名虽小而风力大，它不分青红皂白，硬把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强加在图书馆头上，错误地批判了省馆的办馆方向。其结局是导致“三整顿”半途而废，一九六一年新设的科学服务部撤销。两年以后，一九六六年，湖北省图书馆终于被林彪、“四人帮”打成“文艺黑线专政”的“黑窝子”，横遭摧毁，使党的图书馆事业受到极大损失。

(二)

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十年

中，湖北省公共图书馆系统各单位，历经浩劫，陷于瘫痪状态；被说成是“为封资修服务”、“为遗老遗少服务”的标本。

林彪、“四人帮”对图书馆事业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破坏图书馆事业的方向；二是破坏图书馆的工作；三是破坏图书馆的干部队伍。

林彪、“四人帮”是从搞乱人们的思想入手的。他们推行一条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极力歪曲和篡改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在图书馆工作中，他们把工农兵读者与知识分子读者对立起来，硬说图书馆为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服务是偏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干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从而全盘否定图书馆十七年的工作成绩。“四人帮”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篡改图书馆阶级性的正确含义。他们把图书馆说成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完全抹煞图书馆事业的固有特点和规律，以利于他们使用图书馆宣扬他们的反动政治纲领和种种荒谬理论，同时禁锢其它有益书刊，从而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这样就使得图书馆不能有效地进行工作，无法起到以书刊资料为科学研究和广大群众服务的作用，造成我省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停滞和倒退。

那些年，我省公共图书馆工作者不论是在馆内接待读者的工作岗位上也好，还是下乡下街道进行业务辅导也好，都被“图书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句话紧紧地束缚着，因而下去只着重抓思想工作，大力宣传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图书，忽略了其它知识性的图书的广泛流通，更排斥了为科学研究服务。

林彪、“四人帮”搞破坏，他们不仅把工农兵读者和知识分子读者对立起来，还促使图书馆工作者与来馆读者对立起来。他们胡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又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挑拨离间我们的干部与知识